

大批評家必須博學

黃維樑

今天收到七月份的「書評書目」，裏面有鄭振實「從治學方法看文學批評」一文。鄭氏認為夏志清先生徒然「典故記得多」，其批評見解「多是極尋常的」，又謂其「論點多浮誇空洞之言，禁不得深思」。我認為鄭振實的評斷大有問題。

首先，我要指出，大批評家必須博學。文學批評的最低層次，是精讀過被評作品後，評析其內容與形式的特點。較高的層次，是拿這篇被批評的作品，來和別的同類和異類作品比較，以充分顯示被評作品的特點，並且藉着比較而評價其優劣得失。沒有比較，我們就看不到被評作品的成就。比較的範圍愈大，顧及的因素愈多，則所見愈全面，所下的斷語愈有份量。毫無疑問，文學批評層次的高低，與批評家的學問

成正比（當然，學問之外，還有見識和態度等問題）。我國偉大的批評家劉勰說：「操千曲而後曉聲，觀千劍而後識器；故圓照之象，務先博觀。閱喬岳以形培塿，酌滄波以喻畎澮。」這是千古不易的至理。只有大批評家，才能憑其博學通識，充滿自信地說什麼作品「最」佳，哪個作家「最」偉大。因為只有大批評家才能登上文學批評的泰山，透視一切，經過全面的比較後，把最高的峯巒和最低的窪谷分辨出來。偉大的作家，不見得都是博學的人；偉大的批評家，却非博學不可，非多記典故不可。

夏志清先生學問博，中外文學名著讀得多，這是做大批評家的必須條件。夏氏不但學問博，而且有很多精闢的見解。我在「文學博士夏志清」（刊於「書評書目」一九八〇年三月號）一文中，已舉出不少例子，此處不贅。不過，批評家的見解，有時可能和普通讀者差不多（也就是鄭振寶所說的「尋常」）。例如，夏志清論及魯迅的「孔乙己」時，說這是「一個破落書生淪為小偷的簡單而動人的故事」（見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頁三一）；論及「在酒樓上」時，說這是作者「徬徨無着的衷心自白」（頁三七）。這些都是平實

的意見，高中或大一的學生，都可以說出來。不過，夏志清這位博學的批評家，的確不同凡響。接着上引的評語之後，夏氏繼續說：「孔乙己」的「簡鍊之處，頗有海明威早期尼克·亞當斯故事的特色」；魯迅「在酒樓上」所流露的心情，「和阿諾德一樣：『徬徨於兩個世界，一個已死，另一個却無力出生』」。此外，夏氏還說，我們可以把魯迅那些寫得「最好的小說與〔詹姆士·喬叟的〕『都柏林人』互相比較」。這些話就絕對不是泛泛的讀者能夠說出來的了。

批評家忌的是標奇立異，但不忌尋常。如果你在登山之際，見到的只是平凡的景物，那麼自然不必裝腔作勢，稱讚「江山如此多嬌」。批評家對某些作品，可能只會說些「尋常」的意見，但他如能作多方的比較，使讀者眼界大開，這就不尋常了。夏志清評析「孔乙己」等小說時，徵引海明威、安諾德、喬叟斯的作品以為比較，誠然使讀者眼界大開。批評家必須先苦讀，才能作多方面的比較。批評家的苦讀，真是「十年辛苦不尋常」啊。（其實夏志清先生讀書何止十年，而是十年的數倍。）同是跳水，普通的讀者有如第一次跳水的人，從跳板上雙腳一蹬，撲通一聲就

沒入水中；大批評家則有如奧運跳水冠軍，撲通一聲之前，在空中先翻了幾個姿勢美妙的跟斗。兩種跳水者，誰了不起，還需要我饒舌嗎？

鄭振鐸說夏志清的「論點多浮誇空洞之言，禁不得深思」，真不知他何所據而云。夏氏的「中國現代小說史」，成一家之言，這是早有定評的。夏氏指出中國現代文學充滿了感時憂國的精神，說來不但深得讀者之心，且使人與家國民族之懷。夏氏力崇張愛玲、錢鍾書、余光中、白先勇等當代作家，其論點得到多人支持。如果夏氏的「論點多浮誇空洞之言」，豈能得人擁護？別的不說，就以夏氏評論白先勇的小說一事而言，夏氏說：「白先勇是當代中國短篇小說家中的奇才。這一代中國人特有的歷史感和文化上的鄉愁，一方面養成他尊重傳統、保守的氣質，而正統的西方文學訓練和他對近代諸大家創作技巧的體會，又使他成爲一個力創新境、充滿現代文學精神品質的作家。『臺北人』這一系列作品，不但反映出二十年來中國人的精神面貌，也是民國以後我國部份社會史的一個形象化的縮影。」這段評語不止印在晨鐘版「臺北人」小說集的封底，更爲許多談論白先勇小說的人

所引用。

拙作「文學博士夏志清」文長逾二萬字，如果連附註和附錄算在一起，則達三萬字。「書評書目」編者慷慨大度，把拙作一口氣登出來。拙作在香港發表時，則分成數截。鄭振鐸大概只讀到拙作正文的前半部（也是就「一、文學『博士』」、「二、通識：博觀作品熟識理論」、「三、通達：思想技巧並受重視」、「四、通變：滙通衆說以創新見」這四節，而拙作共分爲十節）。我希望鄭氏把拙作全篇看完，這樣對認識夏志清批評上的成就，當有幫助。看過拙作全文後，我相信鄭氏對夏志清的批評，應可收斂多少。

不過，鄭氏提到夏志清的文章裏面有矛盾，這倒是可能的。任何大學者、大批評家，只要著作年期一長，著作份量一多，就難保沒有矛盾了。王國維貶周邦彥在先，褒之在後；艾略特不讓他「專美」，則貶米爾敦在先，褒之在後。年齡大了，觀點變了，場合不同，百般謹慎中的一兩次疏忽……其後果是讀者眼中的「矛盾」。夏志清先生是非常坦率的人，在比較隨便的雜文裏面，時常流露他某時某地的某些感情，好像說：中國古代詩人的滿腹牢騷，不能引起他的同

感；薔薇謝後，明年會再開，不值得詞人這樣哀悼它。夏氏這些說法，是他一時的「偏見」，是「思想放假」（錢鍾書語）期間情緒的逍遙遊。對夏志清有偏見的人如鄭振寰，自然可以捉住這些「偏見」，大寫文章攻擊他，說他「文學感性非常薄弱」。

批評家是不可能絕對客觀的，但夏志清確能「力求客觀」（拙作語；注意「力求」二字）。大陸出版的文學史，直至今天，還是不能承認梁實秋、沈從文、張愛玲等作家的文學成就，因為他們是右派或者曾是右派。夏志清的胸襟器量大得多了，對魯迅、茅盾等左派作家，他有崇有抑，這才是「力求客觀」的風範。

拙作結尾時說：「夏志清無疑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，極端重要的批評家。論博學、論見識、論批評規

模之大、論影響之巨、論對當代文壇之關注，這些條件加起來一同考慮，現代的批評家中，筆者找不到什麼人可以和他媲美。」我自信這是相當客觀公允的評價。在六月二十二日的「中國時報」，聶崇章先生有文章報導巴黎「中國的抗戰文學」討論會。文中說到「巴黎大學研究中國文學的法國學生，有人正準備研究夏志清的文學論，夏教授聽到這個消息，倒著實吃了一驚」。夏教授的文學批評，誠然值得學者進一步好好研究，他的成就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；他當然也有可議之處。但鄭振寰那類充滿偏見的論調，怎能服人呢？大批評家必須博學。他連這個道理也把握不到，其他還有什麼可說的？

——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深夜

更正

本刊87期第52頁第10行、「以量制價」，乃「以價制量」之誤，特此更正，並向隱地先生及讀者諸君致歉。